

论晚清至“五四”文学中“唤醒”模式的流变

高晓瑞， 兰宏君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中国文学的“唤醒”模式诞生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意识。晚清之“唤醒”意在醒国以救国，将醒人纳入醒国范畴；“五四”文学区分醒国与醒人，着重以人的觉醒为目标。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唤醒”模式在“唤醒”内容、方式与对象上存在不同，但二者都包含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精神内核。“唤醒”模式在晚清与“五四”之间存在延续性的原因是一脉相承的救国意识，二者内涵不同的直接原因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接连失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国民性”焦虑。“国民性”焦虑的强化促使并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中国文学“唤醒”模式流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思想转型。这一思想转型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继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关键词:晚清；“五四”；“唤醒”模式；文学转型；思想转型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24.09.00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24)9-0006-08

随着社会变迁，“围绕着政治、文化、教育、女权等话题而展开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讨论，从晚清一直持续到五四”^{[1]77}。与社会现代化的讨论一致，知识分子“唤醒”的意识在晚清至“五四”之间亦存在延续性。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中的“唤醒”一词，似乎已与“五四”文学的启蒙任务紧密相连。实际上，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有“唤醒”思想，这一思想影响了文学创作领域，催生了文学“唤醒”模式。这一模式在晚清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多见于晚清小说中。或采用西方医学救醒昏睡之人，或直接揭示亡国灭种的危机惊醒国家与民众。前者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用药物洗涤心和肝肺的方式将龙孟华从昏迷中救醒，后者如《孽海花》以国权沦丧警示还在做黄粱大梦的国民。晚清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国族“沉睡”的现实问题。学界对“沉睡”国家的关注与呼唤这一历史议题，已有一些讨论。此类文章从历史学角度探讨问题，或深入探源“睡狮”形象或探索“醒狮”意象蕴含的对民族复兴的

深切渴望。如石川祯浩《晚清“睡狮”形象探源》^[2]、施爱东《拿破仑睡狮论：一则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3]、张昭军《“中国睡狮说”是梁启超发明的吗？》^[4]、俞祖华《“少年中国”·“睡狮猛醒”·“老根新芽”：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文化意象》^[5]。中国形象由“睡狮”向“醒狮”的嬗变并非于无意识间完成，晚清以来的有识之士为“唤醒”中国呕心沥血，他们相信她已经醒来，且将进一步彻底觉醒。先辈“唤醒”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唤醒”模式具备师承性。1928年，诗歌《老爷太太们快醒呀》以中国的少年与学子都已觉醒为由，呼吁“迷梦的老爷太太呀！快些醒来”^{[6]20}。1938年，《上海报》发表谈话体作品《昏睡病与醒狮》，表示孤岛若“得到狮子一声大吼”^[7]，岛上众人必定觉醒。晚清至“五四”时期涉及“唤醒”模式的文献材料整体呈现比较鲜明的特征，本文首先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探索“唤醒”模式，展现这一流变过程，为梳理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思潮的走向提供一个视角。

收稿日期:2023-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师承关系与五四文学活动研究”(22FZWB079);四川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师承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发生(1917-1927)”(SC22C031)

作者简介:高晓瑞(1990-),女,四川自贡人,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兰宏君(2000-),女,四川德阳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然后,本文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阐述“唤醒”模式流变的原因、意义以及局限,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转型,阐述这一思想转型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演进。

一、“唤醒”主题:从“醒国”到“醒人”

疾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类在对抗疾病的过程中,从医学、社会学等角度不断深化对疾病的认知。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疾病在古希腊时期被认为是神圣的惩罚,19世纪则认为疾病由情感或行为的不节制导致。福柯提出,疯癫在文艺复兴之前被认为带有神秘魔法,他借此展开对理性、启蒙与机构体制的批判。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进一步论述疾病的文化隐喻,“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8]111}。“疾病在文学中的功用往往作为比喻(象征),用以说明一个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变得特殊了。”^{[9]265}晚清士人急于拯救落没的“天朝上国”,现实的危机感迫使他们持续怀疑、否定自我。晚清不少文章中都有将当时的社会形容为“病体”的言论,严复在《原强》中形容当时社会为“病夫”^{[10]13},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也有相同的比喻。此类文章中的“病”不是真正的疾病,而是波兰特所指的疾病的比喻义,象征当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变化,比喻晚清面对外敌时的脆弱不堪。晚清知识分子不仅指出了当时中国“患病”,还指出了“病症”所在。1897年,文摘性刊物《集成报》转录《指南报》的文章《酣睡未醒》,文中称“夫以中国时势,如此危急,不思宵衣旰食,卧薪尝胆,而乃偷懒贪睡若此”^{[11]17}。这篇政论文直言虽有志士大声疾呼,但国家仍毫无反应。此类文章更进一步指出晚清的病症在于沉迷旧日辉煌而不奋起谋求富强,以此提出“唤醒”中国的目标。

这一模式不仅存在于政论文中,还存在于晚清小说、诗歌等更具文学性的作品中。1908年,微型小说《睡狮》以街头任人肆意击打的睡狮比喻不求振兴的国家,并发出感叹:“数千年大狮,沉睡如故,有心人抚景伤时,未尝不为之呜咽流涕也。”^{[12]1030}同年,《竞业旬报》发表的议论性散文《快快醒》,以强烈的感情呼唤祖国觉醒,直言若继续沉睡只能把“一片锦绣河山撒了手”^{[13]7}。除了具体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学刊物也具有“唤醒”模式。《中外小说林》是晚清时期比较重要的期刊,强调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功用。其刊载的文章《〈小说林〉之旨趣》的作者坦言小说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可以承担启迪国民的任务。因此将小说作为与大众沟通的媒介,达到“唤醒国魂、开通民智”^{[14]1}的目的。在晚清表达“唤醒”理想的文学作品中,国家处于不可或缺的位置。晚清知识分子如同杜甫,在忧国

忧民的同时,亦明确指出国家、民族的问题所在。在反映知识分子的救国情怀之时,“唤醒”模式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存在强烈的国族焦虑。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突破国族大局观,深入思考“人”本身,旗帜鲜明地提倡“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对外表现为关注个体的人文情怀,对内呈现出“表现自我”的特征,“即使不是直接表现作者的个人生活,也明显渗入了作者的心理、气质和情感”^{[15]27}。“五四”知识分子对人的关注集中于人的生存状态,包括物质状态与精神状态,他们强调文学应该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仍然坚持唤醒中国的努力,但是文学创作的目的已经逐渐倾向于唤醒国人。一些隐含醒国意识的作品,呈现出将国家话语与个性话语交织的特质。《沉沦》中的主人公在日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倍感压抑,跳海前高喊对祖国的期盼,将国家问题背景化。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6]439}“五四”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国人所受的束缚,他们以群众的觉醒为己任。鲁迅作为觉醒的先驱,始终以深邃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直视“国民性”,坚持改造国民的理想。《祝福》中的“我”作为唤醒者存在,当“我”回到故乡,见到受尽苦楚的祥林嫂,意图唤醒她受封建礼教压迫的人性。鲁迅将“国民性”作为突破点,成为“五四”文学中践行“唤醒”思想的代表。

“唤醒”一词有“使觉醒”之意,本文探讨的“唤醒”模式主要指在晚清与“五四”时期的渴望中国与国人觉醒的思想影响下,在文学文本里形成的模式,包括醒国与醒人。有意思的是,“唤醒”模式不论在晚清还是“五四”时期,所涵盖的内容都并不单一。相反,醒国与醒人在晚清与“五四”文学中皆同时存在。1902年,一人以“黄海锋郎”为笔名发表《醒国民曲》,试图惊醒昏睡国民:“国民如病,昏沉沉,大梦千年犹未醒……因此上高歌一曲,唤起那四百兆魂灵。”^{[17]33}在晚清小说中,颇多揭露国民昏睡不醒的作品。

咳!咳!这便是我国民一段最痛心的历史。受了一千多年海洋深的大害,到如今尚不肯醒来,还说是百年养士之鸿恩,一代搜才之盛典哩。^{[18]78}

这一段文字出自《孽海花》,曾朴在此借控诉科举制度控诉封建君主专制。他控诉的落脚点是呼唤民众觉醒,指出若百姓再不从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中觉醒,将“异族凭陵,国权沦丧,还在那里呼声如雷,做他的黄粱大梦”^{[18]78}。与晚清的国族危机感一致,“五四”知识

分子同样意图“唤醒”中国。《凤凰涅槃》以强烈感情呼唤祖国的新生,期盼其结束“前也是睡眠,后也是睡眠”^{[19]36}的状态。郭沫若以一腔热血破醒祖国的醉梦。闻一多的诗歌《醒呀!》同样满腔热血,呼喊“熟睡的神狮呀,你还不醒来?醒呀!我们都等候得心焦了”^{[20]13}。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唤醒”模式上既存在延续性又有变化,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唤醒”模式表面相通,深层内涵上存在区别。

二、从“醒国”之对外救国到“醒人”之向内立人

(一)“唤醒”内容:由危机意识转向理性精神

《政艺通报》1903 年刊载《醒狮歌:祝今年以后之中国也》,诗歌形象地写出晚清中国被列强虎视眈眈,却甘愿屈服的境遇。慈石将未来的中国喻为“醒狮”,既以危险境地警醒“睡狮”,又表达对其能够重新震撼世界的期盼。《醒世歌》以歌谣形式发出中华民族已危在旦夕的警示,疾呼若继续酣睡不醒,亚东大陆将重蹈“黑奴红种”^{[21]31}的覆辙。晚清的“唤醒”思想在外患加剧的情况下产生,知识分子的关注点集中于如何强国以抵御列强。他们多在文学作品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若任由国家处于落后挨打位置,就会导致民族覆灭,希望国家与国人能够感知危机并予以反抗。尽管晚清至“五四”时期一直存在“国民性”焦虑,但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显然更加焦虑于救国。维新派立足国家民族的存亡,鲜明地主张“民智”与“民权”。同样,“唤醒”理想的提出也是仁人志士救国安民情怀的体现,饱含晚清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未来走向的迷茫无措与深深不安。1909 年,陈景韩以笔名“冷”发表《催醒术》,这篇小说隐喻国人处于昏睡病状态,只有采用一种催醒术才能治“病”。然而,最早接受催醒术觉醒的人却陷入绝望状态,因为以“一人之力洗濯全国,不其难哉”^{[22]3}。《催醒术》是少有的呈现感伤情绪的作品,同时期其他表达“唤醒”理想的作品感情都比较强烈。知识分子理性地判断出国家处于危亡之际,但是他们内心越迷茫,呈现给外部世界的感情就越强烈,因为只有奔走疾呼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焦虑。小说《狮子吼》感情鲜明、词气激荡,首先抛出“弱肉强食”的警告,而后将晚清形容为“混沌国”^{[23]33}。小说楔子中出现了叙述者的自述,他自称新的中国少年,高喊自己要以一腔热血去“百计号呼,唤醒群梦”^{[23]33}。“讲大道理、激发爱国心,这是晚清小说的基本模式。”^{[1]78}就晚清“唤醒”模式而言,小说、诗歌与散文均包含强烈的感情——国族危机感与救国热情。醒国理想是强烈感情的产物,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除爱国情怀,晚清知识分子需要唤醒并且希望唤醒的还包括危机意识,故诞生了具有“唤醒”模式的文学作品。

“五四”是一个情绪激荡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推崇理性的时期。这一时期反抗意识强烈,杨春时曾指出贯穿“五四”文学的主题便是反封建^{[24]261}。“五四”知识分子反抗封建礼教的意识强烈,他们在言行上激进且富有激情,但“五四”时期的先驱本质要唤醒的并不是狂飙突进的反封建精神,而是理性精神。“五四”知识分子认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25]202}。在知识基础上建构的感情更为理性,不同于基于血缘关系等建立的感性情感。在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上,晚清文学的理性判断激发其强烈的号召感情;“五四”文学对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转化促发其反抗情感的解放,而不是反封建情感的产生促进其对人之理性限度的探索。“五四”文学以人理性精神的觉醒为前提发生,因为有“我是我自己的”^{[26]115}的理性判断,“五四”青年才敢于反抗族权与父权。陈独秀曾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表示,爱国精神大部分是感性心理的产物,人类应当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动摇”^{[27]647}。陈独秀并不是反对爱国,而是主张爱国行为应该以理性思考为基础。“五四”时期所追求的理性精神反映在文学之上,体现之一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情感是文学的灵魂,同时文学作品也必须具有高深的思想^{[28]36}。然而,由于“五四”时期的作家大部分具有传统文化基因,其追求的从儒家文化中解放个体的行为本身需要强烈的理想主义支撑,这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态度激进的原因之一。“五四”时期的精神倾向于理性,不足的也是理性。一方面,他们在探索如何立人这一问题,而又缺乏对个人言行产生原因的深层思考,如王鲁彦、许钦文等作家对人性的认知与表达较为单一;另一方面,“五四”作家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现实的禁锢,而又极易陷入因此产生的失落感与孤独感中,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庐隐的《海滨故人》与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都带有感伤色彩。

(二)“唤醒”方式:从以批判政治体制为主到集中抨击传统文化

“夫中国之病,政病也,非民病也。”^{[29]24}一类晚清知识分子将国家的不幸原因归结为清政府的统治,他们认为政体问题是造成当时中国处于落后状态的元凶。于是,部分晚清小说将批判政治体制作为“唤醒”方式,这类小说在表达唤醒愿望的同时往往随之指出晚清存在的官吏腐败等政治问题。小说《仇史》带有较明显的反清情绪,称清朝将国民的“五官四体”都束缚了起来,由此造成国家被“异族强邻百般侵夺”^{[30]8}的局面。在小说开端,作者直言创作此书的本意是激发读

者的志气触动其反清精神,从而使全天下“昏昏大梦从云端一交跌醒”^{[30]8}。另有知识分子强调“昏睡”的国民也是重要“病源”,并尝试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严复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他认为要挽救国家就必须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10]15}。晚清还有一类知识分子,既重视“政病”又强调封建专制文化造成的“民病”,梁启超、刘鹗是其中代表。《老残游记》既揭示清朝官员误国,又超前地对宋儒进行了抨击。刘鹗直言:“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治法。”^{[31]6}即要解决当时中国的各种问题,必须先从上至下使之觉醒。刘鹗认为政体问题与文化问题都是导致国族与民众昏聩的原因,所以他在小说中对二者进行抨击。晚清文学的醒国模式包含两种,即批判政治与抨击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抨击体现出知识分子改造国民精神的倾向,指向醒人层面。戊戌变法之前的知识分子以批驳、革新政治为主,他们坚持只有先革新政治才能富国强民。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知识分子的坚持显得脆弱不堪,他们开始痛定思痛,梁启超曾痛彻心扉地指出,不除国民奴隶性中国则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写作《论中国人的缺点》等论著,主张“新民”。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之间是过渡期,知识分子空前地关注“国民性”问题,却没有将改造国民的目标独立于救亡图存的愿望。《六月霜》以秋瑾为原型,女主人公秋女士认为自己的丈夫迂腐落后,是只知醉生梦死的官绅,她“欲将丈夫劝醒了”^{[32]155}与自己一起投身革命。受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晚清文学的“唤醒”模式出现过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倾向,但又将之服膺于推翻封建帝制、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

晚清至“五四”时期“唤醒”方式的流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五四”文学渐渐将晚清已经浮现的批判传统文化独立于政治运动的需求,知识分子逐渐将精力集中于反叛封建文化。他们坚持从中国思想文化根源上寻找“国民性”产生的原因,在这一思想倾向的影响下,《醒呀!》等以醒国为目的的作品也没有鲜明的批判政治体制的表现。鲁迅曾在提倡科学主义的杂文《科学史教篇》中,谈到科学与理性是消除愚昧盲从的奴性状态的必需。鲁迅认为“国民性”涵盖奴性,在封建制度下产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深刻察觉国民的悲剧性所在,他们认为国民的麻木和堕落根源于封建王朝所采取的文化思想专制。所以,他们猛烈地对其进行攻击,只为能够揭露病苦以唤醒国人。继而,“五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的解放并力倡人权,意图将人从封建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五四”文学擅长在人物命运叙述中渗透反封建感情,

以小人物的悲剧反映社会、文化的问题,以小见大证明人的解放的必要性。鲁迅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有四类,即贫苦农民、劳动妇女、封建知识分子和空虚知识分子。他们深刻地反映了旧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觉醒,见证了中国社会在强烈的阵痛中走向变革的历程。

(三)“唤醒”对象:从强调集体到关注个体

探索晚清与“五四”文学在“唤醒”内容与方式的不同,另一个问题渐渐浮现:晚清知识分子没有从心理上区分醒国与醒人,二者的内涵、外延在晚清时期含混不清。除明确将中国形容为“醒狮”的作品外,如《醒世歌》《老残游记》一类作品没有确切指出“醒”的对象,“世”可以理解为“世人”,也可以阐释为“尘世”。《醒国民曲》《孽海花》《催醒术》《狮子吼》《仇史》《六月霜》等则将国人觉醒与国族觉醒密切相连,这些作品的目的仍然是醒国。与其说晚清知识分子在呼唤中国人觉醒,毋宁说他们在呼唤中国民族魂的觉醒,体现出他们强烈的集体意识。晚清知识分子深刻地意识到个人与国家、民族的一体性,同时将个人与集体同构,他们要唤醒集体。这个集体既指向国家又包含国人,所以,晚清知识分子才没有主观区分醒国与醒人。“五四”知识分子亦有国人观念,为了区分晚清与“五四”之“国人”,不妨将晚清文学意图“唤醒”的对象概括为涵盖中国与国民的整个集体。

晚清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特质深刻影响了晚清文学作品。一方面是部分作品表达了国民觉醒国家便会崛起、社会便会改良的渴望;另一方面是晚清小说存在以个人之病症影射国族之病的情节。前者以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为代表,陆士谔在小说中称“中国人患的是心病”^{[33]50}。该小说中的苏汉民作为一个医学家,研究出了医心药和催醒术,能够使沉睡不醒的人苏醒。自从苏汉民的医心药与催醒术发行之后,“国势民风,顷刻都转变过来”^{[33]50}。陆士谔将中国与国人视为集体概念,催醒术专治沉睡不醒的人,既指麻木的国民,也指当时甘于落后的国家。后者以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为代表。哈克参儿在治疗受到不公平待遇而精神崩溃陷入昏迷状态的龙孟华时,表示龙孟华的昏迷不醒是因为遭到“八股”的腐蚀而心胸狭小。龙孟华脆弱的心理与顽固的思想使其无法接受自己处于弱势者地位,选择了昏迷逃避现实。在这篇小说中,龙孟华是当时中国的象征,龙孟华的昏迷不醒隐喻国家沉迷旧梦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国族焦虑。

晚清文学“唤醒”模式的施事者与受事者均拥有相同的文化根源与社会理想,共同肩负民族复兴重任。“五四”知识分子清晰区别文本的目的在于醒国还是醒

人,虽然《沉沦》等部分作品既探索个性话语又隐含国家问题,他们在心理上仍然明晰国与人的界定。“五四”文学意图唤醒的国人不同于晚清文学里心理与文化皆同构的“国民”,而是具有个体意识的人。在“五四”文学规划的醒人目标中,觉醒与“人的基本需要即食的饥渴、性的饥渴、爱的饥渴、生的饥渴息息相关,这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带有原始性的本能欲求和渴望”^{[34]41}。在有关家庭伦理改革的杂文中,鲁迅主张建立以弱者、幼者作为本位的道德,如《我之节烈观》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鲁迅重新回到生物本能层面呼唤国人觉醒,而不是将醒人视为醒国的必备条件。他所要建立的道德观既不是古代士人的忠于君父,也不同于晚清知识分子的救国图强。“五四”知识分子认为奴隶性的产生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这个时期出现的反思宗族与宗族体制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个人对集体环境的不断挣脱。这一情况又直接与反封建礼教精神结合,故王鲁彦、许杰等“五四”一代乡土作家往往以揭露宗族的愚昧黑暗作为反思方式。中国古代乡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个体之间并没有强烈的关联意愿。由于稳定社会的需要,乡土不断强化自身的宗族观念,通过宗族意识将小农生产分散开的人际关系按血缘整合。宗族观念不断强化的结果一方面是对传宗接代的执着和对祖宗崇拜的强化,另一方面加强了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对立,集体的利益掩盖个体的权益。“五四”乡土小说中对宗族文化的批判体现出个体本位意识的觉醒,许杰的《惨雾》、王鲁彦的《岔路》和胡也频的《械斗》都描写了宗族村落之间的利益纠纷,参与打斗的集体对个体的牺牲毫无怜悯之心,揭露了宗族制度的残忍。

(四)精神内核:一脉相承的救亡图存

综上所述,晚清文学的“唤醒”模式在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均体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与救国意识,这一时期醒人的任务是醒国,而救国是醒国的直接且唯一目标;“五四”文学醒人以立人为目标,渴望以唤醒理性精神、抨击传统文化与建构个体本位意识达到立人的目的。“五四”文学以立人为主,在救亡图存这一目标上,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唤醒”模式具有一致性。“五四”文学的醒人、立人、醒国、救国与立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可以把立人看作一个过程,而立国是这个过程的终点”^{[35]77}。尽管醒国、立国与救国并不完全等同,但在“五四”文学所处的环境中,醒国、立国与救国实难明确区别,三者甚至可以互为前提。“五四”文学以人的觉醒、解放与构建为目标,但“五四”启蒙者期盼达到的效果包括民族救亡,“五四”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一直存在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渴望。胡适力倡

“文艺复兴”,试图通过文化更新实现国家转型。陈独秀等人主张通过政治运动实现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鲁迅曾在《文学救国法》中借“文学救国”反驳抨击新诗人的言论:“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36]163}虽然鲁迅看似并不完全支持文学救国论,但他的救国理想却十分坚定。“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7]32}鲁迅改革“国民性”的目的包括改变国家民族的现状,因为他认为如果国民性不改造,无论哪一种政体最终都会走向同一个结果。在救国这一目标上,晚清至“五四”文学的“唤醒”模式在具体内涵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倡导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上一致。

三、“醒国”向“醒人”的重心流变:启蒙主张的实践

中国文学的“唤醒”模式及其所蕴含的“唤醒”思想的流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晚清文学作品中的醒国与醒人理想具有同质性,醒国与醒人的目标没有被区分。晚清将醒人纳入了醒国范畴,最终由醒国指向救国。“五四”文学中醒国与醒人的目标被区分,醒人指向立人,可以视醒国与立人为救国的一体两面,而立人与救国又不完全等同。尽管晚清与“五四”的醒国与醒人之间的联系、区别乃至分类均具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为了更明确地解决问题,本文将晚清“唤醒”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醒国为重心,“五四”文学则以醒人为重心,将“唤醒”模式及其蕴含“唤醒”思想的流变简要概括为重心的流变。流变的原因、意义以及局限是本文意图解决的下一个问题。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37]31}李大钊、鲁迅等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先驱曾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充满希望。李大钊对辛亥革命的感情深厚,与之具有深刻的精神联系,他对武昌起义始终抱有崇尚之情。^{[38]117}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发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一国主权属于国民那一刻,知识分子深感中国有了希望。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各地军阀混战无疑给晚清以来一直谋求富强的知识分子残酷一击。“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39]56}戊戌变法的失败减弱了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革命的热情,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中国的民主共和这一事实,使他们对政治革新丧失信心。在遭遇沉重打击的同时,知识分子惊觉梁启超等晚清先驱强调的如果国民性不改造、国人

的思维方式不改变,中国的民主共和将永无指望的前瞻性。

“五四”知识分子经历了希望迅速变为绝望的心理落差,转而寻求其他方式改造国人思想。不同于中国古代将“启蒙”理解为初学者得到基本知识,西方17、18世纪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性获得复苏与解放。西方启蒙者推崇理性,他们“以果决的态度反对一切权威,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宗教领域的教会统治和世俗社会的封建制度,反抗中世纪以来的神学体系在精神领域的极权统治”^{[40]8}。西方确立的人权思想与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五四”知识分子提供了参考,倡导思想解放的“五四”先驱并不是被动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而是在探索改造国民思想的方式时以西方为参照提出了启蒙主张。“五四”知识分子尤为关注人的理性,正如康德定义“启蒙”为人类不屈服于思想权威,而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判断。在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之前,神权是他们的权威;就当时中国而言,以封建礼教束缚个性的儒家文化被“五四”启蒙者标注为权威。中国文学“唤醒”模式流变的直接原因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接连遇挫,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不断发生的思想转型。晚清知识分子面对国族危机时的自我否定催生了“唤醒”思想,他们唤醒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五四”知识分子师承晚清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信念。“五四”知识分子“国民性”焦虑的加深促使他们完成由否定制度向否定内部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启蒙理性为武器觉醒个体意识,完成了由集体主义意识向个体本位意识的转向。

醒国向醒人重心的流变是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思想史向现代的转型。就启蒙思潮而言,醒国向醒人的重心转移是知识分子实践启蒙主张的一个方式,其本身必然反向影响启蒙思想的实践。中国启蒙意识的朦胧发轫可以上溯至晚明时期,当时产生了朦胧的解放人性的思潮,以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为代表,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从晚明个别文人出现过的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倾向,可见个人意识的确浮出了历史地表。然而,左派王学和异端思想“倡导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但并未彻底怀疑否定封建伦理道德规范”^{[41]65}。在晚明隐含启蒙倾向的社会思潮、文学思潮中,封建伦理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因素。激进地提出儒者“不可以治天下国家”^{[42]126}言论的李贽亦有三教归儒的主张,并认可“君父大义”,反对“篡逆”^{[42]9}。晚明异端知识分子的思想内核仍然是封建伦理道德,经世致用观念构成他们的心理基础,如李贽自诩《藏书》为“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43]135}。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产生严格

意义上脱离忠君孝父的“个人”,晚明知识分子朦胧地启蒙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并反对思想专制,同时也渴望平衡个体情感与封建伦理规范。晚清知识分子尽管没有以平衡封建思想与个人思想之间的冲突为目的,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并不在自我这一个体。《催醒术》作为晚清时期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既隐含启蒙意味又具有科学色彩。然而,探索陈景韩的思想观念,可以发现他的主要目的依然是唤醒国人的民族危机感。“世界至今日,竞争愈激烈,淘汰亦愈甚,外来之种族,力量强我数十倍,听其天然之淘汰,势必不尽灭不止。”^{[44]20}陈景韩以拯救民族为直接目标的同时,间接触及了启蒙话语,《催醒术》与其他晚清文学作品中的“唤醒”模式均不完全等同于启蒙。晚明异端知识分子与晚清“唤醒”模式具有的启蒙意识皆压抑且朦胧,不同于“五四”文学以人的觉醒为目标直击封建礼教。“五四”文学将晚明以来的潜在意识发掘出来,并转化为真正现代性的力量,知识分子从集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转向是推动思想现代转型的强势力量。

回归文学本身,中国文学随社会发展不断变迁,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伴随思想、叙事模式等的转型发生。中国文学将重心从醒国转向醒人是思想现代转型的结果,既体现又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五四”文学以“人的文学”为理论纲领,以对个体的认同与关注彰显其现代因素。既然晚清已经产生呼唤人的觉醒的文学作品,迫切要求国民觉醒的呼声本身已经反映晚清知识分子同样关注人。那么,如何能够证明“五四”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又如何将其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这就在于上文所述晚清之醒人理想的最终指向是醒国。人在“唤醒”模式中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出现,晚清醒人的精神旨归是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与危机意识,将个体情感与国家强弱、民族危亡紧密相连。尽管“五四”知识分子同样存在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但是他们倡导醒人的直接目的并非醒国。他们清晰地知道醒国与救国、醒人与立人是两组概念,两组目标相互联系,但各自独立并处于同等地位。以女性文学为例,晚清女性文学存在丰富的唤醒女性民主、民权意识的内容,如秋瑾作《勉女权歌》倡导民主与救国。“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意识到女性独立人格的基础是他们认识到了“人”是具有独立性的个体,而不是封建文化束缚下君臣父子中的某一个。“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尽管存在局限,但仍然深刻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一代少年中国的叛逆之女出现在历史地表之上”^{[45]66}。

事物普遍具有两面性,启蒙意在解放被思想权威束缚的个人。“五四”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立足于

其启蒙的主张,“五四”知识分子高举启蒙主义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陷入了启蒙主义的束缚中。对“五四”知识分子来说,启蒙主义即将成为新的权威,如同晚明与晚清的知识分子内心仍然奉儒家文化为“圣道”一样。“五四”先驱执着于以文化批判实践启蒙,他们坚持批判传统文化使国人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危害是启蒙的一个方面,反抗封建文化则是启蒙的基本方式。于是,他们必然以更为激进的态度全面反传统。在影响“五四”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同时,对启蒙主义的信任还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影响。“五四”知识分子因为这种信任不愿放弃启蒙主张,而又因自身的理性无法完全信任启蒙与启蒙者,并陷入对启蒙之后又该如何的忧惧中。鲁迅曾在《伤逝》中就表达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启蒙浪潮逐渐落没,鲁迅深感惋惜;20世纪30年代,鲁迅亦倾向于倡导革命文学的左翼阵营。尽管“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观点稍显绝对,但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确影响了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转向,“五四”知识分子对民族危机严重性的理性判断使他们不再执着于启蒙的精神支柱。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将“五四”知识分子从启蒙的悖论与精神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是一脉相承的救亡图存意识。

四、结语

中国文学由晚清向“五四”时期的转型是面向现代的转型,中国文学在前进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以回应时代诉求,这种调整与回应使中国文学拥有可持续的生命力。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存在醒国到醒人的流变,这一流变并不是题材的流变,而是内涵与重心的改变。晚清到“五四”文学在“唤醒”模式上存在延续性,这一延续由于时代风潮的涌动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发轫于救亡意识,在延续与嬗变并行的过程中,“唤醒”模式的流变体现出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型,这一转型最终影响了文学思潮的转向、中国文学的转型。“唤醒”模式的重心流变证明文学的发展演进深受文学环境的影响,其存在的客观延续性则再次表明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源源不断、接续发展的历史过程,相邻历史阶段的文学甚至相隔久远的文学之间存在互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46]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同时,新的文学也在从旧的文学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参考文献:

- [1] 杨联芬.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 石川祯浩.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87-96.
- [3] 施爱东. 拿破仑睡狮论:一则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 [J]. 民族艺术,2010(3):6-16.
- [4] 张昭军. “中国睡狮说”是梁启超发明的吗? [J]. 史学理论研究,2021(6):74-83.
- [5] 俞祖华. “少年中国”·“睡狮猛醒”·“老根新芽”: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文化意象 [J]. 东岳论丛,2016(9):82-93.
- [6] 觉. 老爷太太们快醒呀 [J]. 反日运动专刊,1928:20.
- [7] 芳草. 昏睡病与醒狮 [N]. 上海报,1938-8-27.
- [8]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9] 维拉·波兰特. 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M]//叶舒宪. 文学与治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10] 严复. 原强 [M]//黄克武.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11] 酣睡未醒 [N]. 集成报,1897-4-5(1):17.
- [12] 乍. 睡狮 [J]. 中外小说林,1908,2(1):1030.
- [13] 挺夷. 快快醒 [N]. 竞业旬报,1908-4-21(15):7.
- [14] 《小说林》之旨趣 [J]. 中外小说林,1907(1):1.
- [1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M]. 修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
- [16] 鲁迅. 呐喊·自序 [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7] 黄海锋郎. 醒国民曲 [N]. 杭州白话报,1902(4):33.
- [18] 曾朴. 孽海花 [M]. 北京:知识出版社,2015.
- [19] 郭沫若. 凤凰涅槃. 女神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20] 闻一多. 醒呀! [J]. 现代评论,1925(29):13.
- [21] 醒世歌 [J]. 女子世界,1904(1):51.
- [22] 冷. 催醒术 [J]. 小说时报,1909(1):3.
- [23] 陈天华. 狮子吼 [M]//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仇史·狮子吼·如此京华.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 [24] 杨春时.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5] 傅斯年.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J]. 新潮,1919(1):202.
- [26] 鲁迅. 伤逝 [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7] 陈独秀.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M]//独秀文存:第3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 [28] 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 [J]. 新青年,1917,2(5):36.
- [29] 论欧人搅醒中国 [N]. 集成报,1898-3-25(31):24.
- [30] 痛哭生第二. 仇史 [M]//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仇史·狮子吼·如此京华.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 [31] 魏绍昌. 老残游记资料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2] 静观子. 六月霜 [M]//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仇史·狮子吼·如此京华.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 [33] 陆士谔. 新中国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4] 朱德发. 朱德发文集:第4卷·五四文学新论 [M]. 济

-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 [35] 张光芒. 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 [36] 鲁迅. 文学救国法 [M]//鲁迅全集:第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7] 鲁迅. 两地书·八 [M]//鲁迅全集:第1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8] 朱成甲. 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9] 康德. 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M]//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40] 刘中树,许祖华.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41] 廖可斌. 理学的二重性及其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 [M]//理学与文学论集.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 [42] 李贽. 藏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3] 李贽. 与耿子健 [M]//李贽全集注:第3册·续焚书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44] 冷血. 侠客谈·刀余生传 [J]. 新新小说,1904(1):20.
- [45]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46]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M]. 宋伟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wakening Modes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GAO Xiaorui, LAN Hongj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awakening mod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llectuals seeking to save their nation. Such awakening in late Qing aimed to wake up the Chinese people so that their nation could be saved. Therefore, the awakening of individuals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awakening of the n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distinguished between awakening the nation and awakening individuals due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and the awakening of individuals was the goal then. The awakening modes in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differ in terms of content, methods, and targets. However, both embrace the spiritual core of intellectuals seeking to save their nation. The continuity of the awakening mode between the late Qing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lies in the continuous consciousness of saving the nation, while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nsecutive failures of the Hundred Days of Reform in 1898 and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1911. The failures intensified the intellectuals' anxiety ou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anxiety prompted and reflected the intellectuals'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system, 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awakening mode in Chinese literature 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system. This transformation propell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ubsequently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awakening mode; literature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system

(责任编辑:杜玄图)